

绪论

文学拥有人类共同的道德观和伦理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庭，也努力建设、保卫着自己的家庭；同时每个人也知道尊重别人的家庭。这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之一。

在文学创作上，“家庭”是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许多文学作品围绕着家庭及其伦理和道德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描写和探讨。各国文学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传统，但文学作品却依然表达着人类心灵共同感受的东西。文学有着跨越时空的魅力。另一方面，各个地域、国家、社会和各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家庭伦理文化，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这种伦理文化不仅无法超越该社会和历史的制约，也不能摆脱自身发展和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

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戏剧、18 世纪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9 世纪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 20 世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法国小说家罗歇·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斯坦倍克的《愤怒的葡萄》等，所有这些作品都以家庭为舞台，描写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表达了主人公或者作者当时的家庭观和伦理价值观。

在我国文学史上，“家”也是经久不衰的主题。仅就现代文学而言，就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祥林嫂》、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当代文学中，还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家族》、李佩甫的《李氏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银城故事》、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毕飞宇的《叙事》、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等。

以家庭形态、家庭关系为素材，全面、正面地表现家庭生活的幸福或危机，描写家庭与家族之间的关系、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的小说屡见于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日本文学，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文学（1868 至今）当然也不例外。

在日本文学中,从物语到今天的小说、剧本,描写和表现家庭、探讨家庭伦理道德的文学作品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被誉为“物语文学之鼻祖”的《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井原西鹤的“好色”系列小说,到明治文学中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樋口一叶的《十三夜》、田山花袋的《棉被》《生》《妻》《缘》、岛崎藤村的《春》《家》《新生》、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从那以后》《门》三部曲和《心》、森鸥外的《半日》、志贺直哉的《和解》以及当代文学中安冈章太郎的《海边的光景》、庄野润三的《游泳池畔小景》《静物》等家庭小说系列、小岛信夫的《拥抱家庭》、大庭美奈子的《三只蟹》、黑井千次的《奔驰的家庭》,还有当下畅销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吉本芭娜娜的《厨房》、柳美里的《家庭电影》、村上龙的《最后的家庭》等,毫无例外地描写了家庭、家庭与家庭、家庭与企业、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与瓜葛,描写了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各个时期不同的道德伦理观,体现着各个时代所独有的道德伦理价值。

同西方相比,日本的家庭概念具有集体性、服从性的特点。历史上,日本的家庭多为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而西方的家庭则指的是由夫妻、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因此在论及20世纪上半叶日本家庭伦理道德时总会分析大家族对小家庭的制约、羁绊等。另一方面,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家庭伦理道德。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家族意识很强,比如婚后妻子必须改姓,死后必须下葬在家族坟地里等。日本还强调家族、家庭的凝聚力和荣辱观,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兄友弟恭、勤俭持家等这些传统的家庭观念至今仍为日本社会和日本家庭所遵循、提倡。

日本社会以家庭为本位,群体价值与人际和谐居于首位,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 and 他人。日本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分子,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同时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相比之下,西方的社会根基在个人,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西方社会赞扬人的价值,提倡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为平等,子女与父母之间没有太多依赖性。父母老了以后不以子女为依赖,子女也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双方没有太多义务与责任。这些差异既导致了在文学表现上日本与西方的不同,也形成了日本家庭小说明显的特点,尤其以20世纪以来的小说最为鲜明。

20世纪下半叶起,日本社会的大家族已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家庭的两个中心点:亲子矛盾和夫妻矛盾。但即便同样是描写夫妻和子女的关系,日本与西方在故事的主题、表现重点等方面仍然不尽相同。

中日两国虽同属东亚，日本又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家庭伦理上仍然存在着差异。日本人的家庭、家族制度并不讲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他们可以通过收养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确保家庭、家族的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则不然。所以，日本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忠，强调家庭成员对父亲及父权制的绝对忠诚；而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核心是孝，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更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尊敬。这些差异在 20 世纪日本的家庭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读者从日本近现代家庭小说中可以获得教诲和启迪，日本近现代家庭小说也因此而彰显出文学伦理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某些家庭小说甚至成为 20 世纪日本小说的经典。

本书选择几篇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家庭小说，按时代的先后排列，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进行论述和分析，可以构成一本 20 世纪日本文学中家庭小说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小册子。当然，书中的分析方法和见解毕竟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会有许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家庭小说概述

1.1 家庭小说的定义以及其与“家庭小说”的区别

20 世纪日本小说中描写家庭的文学作品俯拾即是。这些作品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小说和戏剧中,譬如日本的现代派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同样也有描写家庭的段落、篇章,表现的也是诸如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但这些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个人或个体的冷漠、孤僻,社会或个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这类小说表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深感无援无助,束手无策,或者是借此展开对某一杀人事件的推理、破案等。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现人物的命运与家庭衰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家庭描述在小说中仅占叙述的次要、甚至更低的位置,如夏目漱石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从那以后》《门》、安部公房的《墙——S. 卡尔玛氏的犯罪》《赤茧》、川端康成的《雪国》、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1Q84》、东野圭吾的《嫌疑人 X 的献身》,等等。这类作品不符合本书所要论述的家庭小说的定义,所以不在本书所要分析、批评的范围之内。但这些小说毕竟涉及家庭,描写家庭,在日本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有的作品甚至成为日本 20 世纪文学的经典。它们与本书所要论述的家庭小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搁置一边,充耳不闻。为此,笔者将在书中每一章的文学史概论中就其家庭及文学伦理意义做适当的解读。

那么到底哪些小说是本书所定义的家庭小说呢?这里首先有必要对 20 世纪日本小说中有家庭描写的小说和以家庭为中心,正面地、全面地描写家庭的小说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区分,即分清在小说主题、表现方法上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本书所要论述的家庭小说指的是以婚姻、家庭、家族的描述为轴心,延伸及世态人情,或者进一步扩展到家国兴亡的小说,简单地说即以家庭为焦点,表现家族、家庭、个人在振兴或衰亡中的命运的小说。拿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来做进一步解释的话,其主题是批判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揭露明治时期官场的腐败和人情的淡薄,家庭的描写在小说中明显只占有次要的地位。男主人公内海

文三出身于旧幕臣家，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15岁从静冈来到东京，寄宿于叔父圆田孙兵卫家中。叔父在横滨工作，不能常回家，家中只有叔母阿政和女儿阿势。家庭的大权实际掌握在阿政手中。文三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东京的某学校毕业后进入政府机构，当了一名小职员。叔母为人势利，想到文三将来会有出息，有意将女儿许给文三，文三也早把她们视为亲人。文三为人诚实，性格内向，不喜欢巴结上司，在一次人员裁减中突然被免职。从此，阿政不仅对文三冷嘲热讽，而且也不再提已默许的婚事。就在同时，文三的同事本田升开始频频出入圆田家。本田为人油滑，老于世故，很快获得了阿政的喜欢，博得了阿势的欢心。老实巴交的文三试图改变目前的状况，但力不从心，痛苦万分。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诚实无法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足，为什么那些好巴结上司的小人却能步步高升……

小说批判了明治官僚社会的腐朽，抨击了趋炎附势的新型官僚和贪财市侩的小市民。它揭示了封建落后性与近代自我觉醒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所谓“维新”表面化和不彻底性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小说中虽然大量地出现了家庭、恋爱的描写，但都是为揭露趋炎附势的官僚和贪财市侩的小市民心理这一主题服务的。文三被裁减和家庭之间不存在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所以《浮云》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正面描写家庭的小说。

像《浮云》这样，文中带有家庭、家庭关系的描写的小说，在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中还大量存在。20世纪初，夏目漱石发表了《三四郎》《从那以后》和《门》，描写了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中的不适、不安和无力，构成了漱石文学中的“前期三部曲”。小说的主旨在于表现个人与社会的隔阂，个人最终无所适从，走投无路，深陷绝望。同样，三部曲中虽然都有家庭的描写，但作者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表现家庭本身，而在于表现主人公的内心和精神面貌。家庭以及家庭关系、人物关系只是为了更好表现主人公生存、生活的环境，并非是小说的主题思想，仅属于次要部分，所以也不在本书所要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上讨论的是小说中出现家庭描写的小说与正面、全面展示和描写家庭小说的区别。当然，对这种区别的解释和划分多少是出于本书叙述上的便利，定义上还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有待于同仁做进一步的批评和完善。接下来还需要说明的是家庭小说与“家庭小说”的区别。

在日文里有“推理小说”“历史小说”“SF小说”的说法，同时也有“家庭小说”这一称谓。明治30年代，即19世纪末日本文学史上专门有“家庭小说”这一系列，但它同样不属于本书所要论述批评之列。

明治30年代，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当时流行的爱情悲剧小说的腻烦，另一方面也出于文坛发展的需要，小说家们纷纷寻找新的表现题材。“甲午战争”的胜利极

大地助长了日本国民的矜持与自信，日本文坛也乘势加快了创新的步伐。受当时一些翻译小说的启示，日本人看到了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手法，同时也认清了“本国（爱情）小说的轻浮”，于是有先行者提出小说应该表现生存竞争的险恶，表现生活的困苦艰难，从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895年，《文艺俱乐部》杂志就先后登载了泉镜花（1873—1939）的《夜行巡查》、广津柳浪（1891—1968）的《黑蜥蜴》、德富芦花（1868—1927）的《不如归》等。这些小说着重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死亡、贫困和疾病，展现的是人生的阴暗和悲痛，因而被称为“悲惨小说”（在明治文学史又被称为“观念小说”“深刻小说”——笔者注）。但由于作家们过于渲染人生的悲惨，题材和表现手法日趋雷同，人物刻画呆板甚至虚假，最终引起读者的反感，于是社会上又呼吁“光明小说”，渴望表现和赞美幸福家庭、欢乐人生的文学作品。“家庭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查阅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五版）和小学馆的《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其中均有关于“家庭小说”的解释，归纳起来大致如下：①针对家庭（成员）的健康而通俗的小说；②以家庭关系为起因，以家庭悲剧为题材的小说。

当时“家庭小说”的代表作有菊池幽芳（1870—1947）的《我之罪》（1899—1900）、中村春雨（1877—1941）的《无花果》（1901）以及田口掬汀（1875—1943）的《伯爵夫人》（1905—1906）等。这些作品或表现婆媳之间的对立以及夫妻恩爱，女性为家庭献身；或表现女性为寻求光明、幸福的生活而历经艰辛，最终打动丈夫，展现出一幕幕普通家庭的爱情和生活图景。

“家庭小说”多为长篇，连载于报纸杂志上。其主人公多为中上流社会的子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容、忍耐、美丽、善良等优点。它主要以家庭妇女为主要阅读对象，具有教养小说的味道。菊池幽芳在谈到当时的“家庭小说”的宗旨时曾这样归纳道：“资家庭和乐，长家庭趣味。”当时的“家庭小说”带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小说中的婆婆乖张狠毒，丈夫迂腐古板，妻子热情奔放，对爱情和家庭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经过多次的打击和不懈的抗争，妻子最终取得了胜利。

“家庭小说”宣传的是欧洲传统式的、基督教式的家庭观，同时具有较明显的通俗性、演义性、可读性和娱乐性，与本书所涉及的全面、正面描写家庭的家庭小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属于本书将要探讨的范围。况且，明治30年代的“家庭小说”昙花一现，几年时间内便偃旗息鼓，随之被后来的自然主义小说，即本书所涉及的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家庭小说所取代。

明治30年代的“家庭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女性，尤其是妻子在社会、家庭中所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作者揭露的是封建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迫害和压迫，其社会意义在于批判当时的社会，教育世人，因而具有明显的启蒙意义和感化作用，也

就是《广辞苑》和《日本国语大辞典》中所指出的①类作品。而所谓“以家庭关系为起因，以家庭悲剧为题材”的②类作品，表面上合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战后）20世纪50年代日本所出现的家庭小说的特点，即战后“第三新人”流派所创作的家庭小说，但战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小说在表现家庭崩溃的根本原因上，似乎很难将其归咎于家庭某一个成员或者夫妻关系，也很难说清楚小说表现的就是一种家庭悲剧。例如庄野润三创作的家庭小说中，《游泳池畔的小景》里无时不在担心丈夫安危的妻子和为找工作四处奔走的丈夫，还有《傍晚的云彩》里所表现的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丝毫都没有家庭将要崩溃的迹象，当然所表现的也不是家庭悲剧。再如村上龙的《最后的家庭》中，全家人为儿子的康复不懈努力，最后帮助他战胜疾病，回归社会，同样表现的也不是家庭悲剧。庄野润三的笔下描写的是人们往往疏忽大意的“日常”，揭示了“日常”中时刻隐藏着“非日常”。他的小说试图在提醒读者“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所以，②所定义的小说也不完全符合本书所要探讨的家庭小说的本质。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以家庭关系为素材，将其作为作品的主题，自始至终展示家庭的变迁，表现家庭与小说人物紧密关系的小说。比如田山花袋的《生》、岛崎藤村的《家》、小岛信夫的《拥抱家庭》、黑井千次的《奔驰的家庭》、村上龙的《最后的家庭》等小说。以岛崎藤村的小说《家》为例，它讲述的是家族的衰亡和新家庭的迷茫。作品表现的主题是家族、家庭的兴衰，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无不跟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通过家族、家庭的兴衰以及伴随其中的人物命运来反映近代日本社会的变迁。这种表现家庭的小说不同于明治30年代的“家庭小说”。

日本学者大久保典夫在论及日本战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庭小说时，使用“家庭小说”这一称谓^①，山田有策教授则有意使用“家族小说”来区别与明治30年代的“家庭小说”，并指出：

回顾日本近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有家庭描写的小说做一个编排。比如最早的作品，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坪内逍遙（1859—1935）的《夫妻榜样》（明治18年—明治19年，会心书屋）、《妻子》（《国民之友》，明治22年1月），或者还可以举出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浮云》（明治20年—明治21年，金港堂）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描写到了家族。不过，我在此谈到的家族文学作品指的不是这些。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做的定义的话，那就是文学作品自身必须始终以家族的内部关系性为主轴，这是家族文学作品的特征，也是讨论的前

^① 大久保典夫。现代文学史の構造[M]。東京：高文堂，1989：185-195。

提。换句话说,家族中所隐藏着的能量必须成为作品展开的动力,必须是通过作品来表现家族所有的魅力。基于这一定义,刚才列举到的小说,虽然也谈到了家族性,但终归只是停留在表层或框架上,与我列出的条件不完全符合。^①

我认为山田有策的“家族小说”一词比较符合本书所要论述的家庭小说意思。日语中所说的“家族”带有家族和家庭两层意思,所以山田有策所说的“家族小说”自然也包括了大家族和小家庭这两种家庭形态。本书出于中文表达的习惯,使用家庭小说这一称谓,但本质上属于山田有策提出的“家族小说”的范畴。为了区分二者,笔者以打引号的“家庭小说”表示明治30年代前后的作品,而用不打引号的家庭小说来表示本文所要具体论述的作品。

总之,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全面描写家庭、表现家庭和主人公命运的家庭小说。在20世纪的日本文学史中,它不仅包括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创作的被称为自然主义流派的小说,也包括反对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如森鸥外以及“私小说”的代表作家志贺直哉、战后的“第三新人”以及当今活跃于文坛的黑井千次、吉本芭娜娜、柳美里、村上龙等作家。这些小说构成了20世纪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家庭文学的主流。

1.2 家庭小说的研究方法

家庭小说的研究方法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

在对20世纪日本的家庭小说及其伦理价值的研究进行探讨和阐释之前,首先有必要对20世纪日本的家庭小说进行梳理,看看它们具体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以便于更好地认识和探讨。总的来说,20世纪日本的家庭小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重在表现伦理、亲情,表现情理冲突的叙事。如岛崎藤村的《家》、森鸥外的《半日》、志贺直哉的《和解》、菊池宽的《父归》、小岛信夫的《拥抱家庭》、柳美里的《家庭电影》等。这类小说以家庭、家族生活为出发点,表现伦理道德、门第婚姻、宗亲关系、子女教育、家族传承等对个体生命、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牵绊,赋予了小说浓郁的伦理亲缘色彩。小说表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家庭的危机,通过其反映了作品人物以及作家对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拷问,进

^① 山田有策. 家族の発生——田山花袋「生」をめぐる。// 佐藤泰正. 文学における家族[M]. 東京: 笠間書院, 1988: 27-28.

而引起读者的深思。

第二种是重在表现厚重的历史感,如田山花袋的《生》、菊池宽的《父归》、安冈章太郎的《海边的光景》、黑井千次的《奔驰的家庭》等。它以家族羁绊的衰亡、子女的成长、小家庭的诞生等系列过程,表现了20世纪日本的家族史、平民史。它所描述的历史只是立足于家族、家庭这一空间,以生活于某一“历史”片断中的人物去展示民族文化史,揭示文人心灵史以及基于伦理判断的道德史观。

第三种是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如安冈章太郎的《海边的光景》、黑井千次的《奔驰的家庭》、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等。这些是以家庭中的主要人物为中心,通过其生存状态,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通过描写爱情、婚姻、家族伦理、家庭冲突等内容,展现了时代变迁,传达作家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第四种是救赎家庭的叙事,如庄野润三的一系列小说、吉本芭娜娜的《厨房》、村上龙的《最后的家庭》等。这类小说描写了人们互相帮助,挽救家庭的行为,表现了家庭的温暖,充满了关爱,具有积极向上、振奋人心的特点,是当代日本家庭小说的代表。

以上四种类型的家庭小说无疑都是以表现“家庭”为中心,所不同的是,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或宏观或微观地表现了家庭的历史和现状、家庭的内部矛盾以及家庭与时代的关系。

因为毕竟是小说,我们当然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学研究方法,但笔者认为,最适合的研究方法还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聂珍钊等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东方道德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探讨和摸索而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它是一种从伦理道德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的批评方法,目前广泛运用于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中。但在东方文学领域,尤其是20世纪日本文学领域尚不多见。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即历史地、辩证地批评文学。它绝不是简单地用某种道德标准去判断文学的道德价值,或是简单地用某种道德观念去对文学进行褒扬或批判。它的主要目的在于阐释建构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现象,客观地研究文学的伦理与道德因素,并讨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简而言之,就是要求用伦理学的方法解读文学。^①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以及作家创作

^①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 8.

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且也在于从伦理和道德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现象。例如作家与创作的关系、作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特点、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形成的过程;作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作品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道德现象的关系;文学如何在虚拟的世界里再现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作品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作家的道德观念与作品所表现出的道德倾向的关系;作家在作品中关于道德的描述;作家对其塑造的人物的道德评价;读者对作家的道德观念及作品的道德倾向的感受;读者对作者的道德观念及作品的道德倾向的评价;作品的道德倾向对读者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作家和作品的道德倾向做出评价;作家道德观念与作品所表现的道德倾向与传统的关系;作家的道德观念与作品的道德倾向对同时代及后来作家以及文学的影响等。

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必然地包含着它的伦理内容。因此,即使是作家有意地避免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做出明确的道德判定,其作品中也必然包含着自然状态的“伦理内容”——不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志,而是出于社会生活的原始规定,没有伦理内容的社会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以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为例,小说中久木和凛子两个人发生了婚外情,他们从幽会到同居直至自杀,许多研究者、读者对此有着不同观点和看法。有的论文为他们敢于摆脱旧的伦理思想、冲破旧道德的束缚而拍手叫好;有的论文为他们追求浪漫的爱情,最终双双自杀而唏嘘不已;有的论文指出凛子丈夫的虚伪;有的论文分析了小说中社会、公司的冷酷无情,最终使久木和凛子双双走上了绝路。这些论文的分析都有道理,但都只谈到了事物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未能全面地分析两人出轨的内外原因以及他们的行为对家庭和社会所产生的正负影响问题,而能够全面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只有文学伦理学批评。如果运用文学伦理学进行分析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原点,弄清他们各自的伦理身份、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然后才能评判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的价值。从结论上来说,久木和凛子的所作所为已经破坏了我们今天作为社会人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提倡的行为。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小说《失乐园》所具有的伦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可见,“文学伦理学批评又不同于传统的道德批评,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和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且从

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①事实上,伦理内容一直隐含地存在并且主宰着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趋向。进一步来说,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这是指做人的道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它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研究社会的伦理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首先在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即使研究文学也是出于研究人类社会的目的。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即使研究人类社会也是出于研究文学的目的。再者,伦理学研究往往是为现实中一定的道德观念服务的,也需要对现实社会的种种道德现象做出评价,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第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它重在文学的阐释;而伦理学则既是一种有关人类关系和道德规范的理论,也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重在历史的意义上研究文学,而伦理学重在现实的意义上研究社会。^②

再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为例进行分析的话,我们能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文学伦理学批评。小说中男主人公张俭与日本女子竹内多鹤之间是非婚姻关系,两个人当时属于非法同居。几十年来两人共同生育了三个小孩,并一起将他们抚养成人。仅从这一点来分析的话,两人的行为有悖于伦理道德。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再来解读小说,从主人公的种族身份、家庭身份、伦理因素等几个方面出发,遵循当时的客观历史原因,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伦理选择的合理性。

小说里的张家由张俭和妻子朱小环、小姨朱二环及三个孩子所组成。朱二环真名竹内多鹤,随父母一起来到中国东北。1945年日本战败时,她幸免于日本人自杀的枪弹,被张家捡了回来。早年有孕在身的朱小环因日本兵的追赶从山上跳下,造成流产且终身不孕。张俭的父母寻思着让多鹤为张家生孩子,事成之后就

^①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14.

^② 聂珍钊.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1): 9.

让她走。为了报答张家的救命之恩，多鹤先后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但随着东北和全国的解放，多鹤实际上已无处可去。她只得以张家小姨的身份隐姓埋名，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政府着手解决“残留孤儿”问题时她才恢复自己真正的名字。在竹内多鹤身上既有种族身份，也有伦理身份和家庭身份，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同居关系来批判人物的所作所为。

所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对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给我们带来的道德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①。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自己的理论术语和话语体系，如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伦理混乱、伦理禁忌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这些批评术语，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对作品中呈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伦理分析，挖掘人物和事件之中蕴藏的伦理价值以及道德倾向，揭示文学作品对于社会和读者的道德警示和教诲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范例分析，强调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分析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过程及其结果，揭示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3 家庭小说和文学伦理的文献综述

对于20世纪日本的家庭小说，无论是从作家论还是从作品论、文本、互文性等各方面来说，日本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令人折服的研究成果。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立足于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立场来研究明治时期家庭小说的有川本彰（1925—2001）。他撰写了《近代文学中〈家〉的构造——基于社会学的考察》（社会思想社，1973）一书，以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及作品为对象，从明治时期日本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地租和土地制度的改变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包括夏目漱石、森鸥外、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志贺直哉等在内的七位作家及其作品，论述了明治和大正两个时期的家庭与社会、经济的主题，考察了小说中家族、家庭变化的原因和表现手法的特点，颇有见地。作者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近代文学与《家》的研究课题”中这样说道：

明治近代的“家”是以天皇制国家体制为基础，以旧的武士式的“家”为模式再编制而形成的。正如我在绪论中所谈到的那样，“家”被纳入国

^①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6.

家体制后，反抗之牙就被拔光了。

本来，“家”会因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构造。从社会条件来说，因为地域、阶级、身份、职业等的不同，其构造、形态也相异。……上述传统的“家”到了明治近代却遭到了否定。虽然经过了不断的妥协，遭到了各种扭曲，但其本质最终还是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有旧的武士之“家”。这种“家”得以公认，法制化，最终被纳入明治天皇制家族国家的机构下。其结果就在于“家”的原理就是国家的原理，对于“家”的反抗就等于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抗。本书的各章分别论述了一些作家，因为自我的觉醒而走上反抗“家”和国家的道路。……如在家庭面前最终屈服的高村光太郎，抽身出逃的永井荷风，设法与家庭求和的鸥外、漱石以及最终反抗到底的石川啄木等。……在此需要再谈谈岛崎藤村。要说起来的话，此人属于调和型。虽然同属调和型，但他既不同于最终神经衰弱的漱石，也不同于最终绝望的鸥外。他很清楚自己与“家”、社会无法调和，于是采取了忍耐、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①

很明显，川本彰运用的是将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考察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研究和提出观点。他的许多观点至今还影响着当下学者的研究。例如在该书第五章第二节“自然主义及那个时代”中，作者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描写“家”的作家及作品分析和评价都十分中肯。他写道：

众所周知，（日本的）自然主义开始于明治30年代中叶，通过对“家”的批判而勇敢地抵抗社会。……这样便出现了自然主义文学，以无理想、不解决（的态度）为前提，以暴露现实为目的。如果树立理想的话，势必与国家权力相冲突；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又要同社会本质相对抗。这些都是危险的。因此不树立理想，也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一味暴露现实。而且（这种暴露现实）不直接以国家为对象，仅限于社会最底层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家”。这种（方式）不仅是自然主义作家，而是所有作家所共通的态度。^②

除了川本彰运用文学社会学考察家庭小说外，另外还有采取大致相同的手法

^① 川本彰. 近代文学に於ける「家」の構造—その社会学的考察[M]. 東京: 社会思想社, 1973: 281-283.

^② 川本彰. 近代文学に於ける「家」の構造—その社会学的考察[M]. 東京: 社会思想社, 1973: 233.

来研究近代社会、家庭与小说表现的日本学者平冈敏夫。他撰写了巨著《日俄战后文学研究》(上、下卷,有精堂,1986)。

在《日俄战后文学研究》下册中,作者选择了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公子哥》(1906)、《从那以后》(1909)、《门》(1910),田山花袋的《生》(1908)、《妻》(1909)、《缘》(1910),森鸥外的《半日》(1903),岛崎藤村的《家》(1910—1911)以及伊藤左千夫的《分家》(1911—1912)等近十部长篇小说,前后用了六个章节的篇幅,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日本文学中的“家”与家庭,分析了自然主义作家是如何表现日俄战争后“家”和家庭的变迁,以及个人在这种情势下的失落、觉醒、无奈和落魄。

作者从作家的生平、家庭环境、社会经历等多个方面入手,仔细地分析了各个作家的个人经历与作品的主题、表现手法之间密切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出了许多令人折服的观点。在序章“家与家庭”里,平冈这样指出:

被看作是自然主义文学固有范畴“家”的主题,实际上在日俄战争中以家族、家庭的危机和崩溃震撼了作家,自然主义以外的作家也未能幸免。家族的问题必然具体涉及它的生活形态,即家庭的问题。家族的崩溃未必能保证家庭的成立。个人在家族和家庭之间毫无立锥之地,显得孤独无援。日俄战争中统一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慢慢地消失、崩溃,个人的觉醒或者由此产生的孤独意识出现了。它们与家族、家庭的危机和崩溃相呼应,波及个人以及家族的危机。^①

有趣的是,川本彰和平冈敏夫论述的都是明治文学中描写的家庭的小说,论述的作家及作品几乎一致,但两人的切入点、侧重点不同,恰好给研究明治时期文学的人提供了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家庭小说的翔实资料和观点。

上述著作基本上集中在对明治和大正两个时期小说与家庭的研究,而对于战后家庭小说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推举江藤淳(1933—1999)的著作《成熟与丧失》(河出书房,1970)。江藤从文化学、民族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文本解读的方法,分析了“第三新人”笔下的家庭表现、夫妻关系等特点,深刻地挖掘了战后日本家庭中“父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以及亲子关系的种种变化。作者细读了“第三新人”尤其是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的文学作品《海边的光景》《拥抱家庭》后,指出作品中夫妻矛盾、亲子关系的疏远,实际上一方面是多年来受压抑的日本社

^① 平冈敏夫. 日露戦後文学研究[M]. 東京: 有精堂, 1986: 167.

会矛盾在战后的爆发,另一方面是战后妇女解放运动、父权制衰落等社会历史原因所致。他指出,过去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日本,妻子、孩子不可能离开家庭而自立,因此封建时代的家庭基本上是牢固的。然而在工业社会发达的今天,妻子、子女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常态。这使得以母亲为主的、传统的家庭内部管理模式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

江藤的这些分析博得了日本学界的好评。不过他的学术观点立足于比较文化社会学,以美国文化为参照物,并没有从文学(史)角度论“第三新人”流派,略显不足。不过,江藤的这一著作最终成为解读战后描写家庭的小说尤其是“第三新人”文学时所不可忽视的理论著作。他的真知灼见将在后面分析有关“第三新人”流派中一一予以介绍和批评。

此外,由藤井贞和等编写的《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12卷-14卷,岩波书店,1996—1997),由东乡克美、小森阳一、石原千秋等人合著的《讲座 昭和文学史》(共4卷,有精堂,1989),还有小森阳一、井上厦等人合著的《座谈会 昭和文学史》(共6卷,集英社,2004)等,均包含有日本近现代作品中表现家庭的论述。如在《讲座 昭和文学史》第四卷中就专门列出两章,分别阐述了“第三新人”流派的文学的特质,以及“母亲”、家庭、日常等与其相关的问题。他们的观点与诸如川村湊的《访寻昭和文学——其体验和理念》(岩波书店,1995)等著作一起,都将在后面分析具体的流派、作家、作品时予以详细介绍和批评。

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我国日本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而言,运用文学伦理学进行研究,英美文学方面又远远超过日本文学。但即使这样,日本文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和论文。

魏大海(2006)的《日本当代文学考察》是一部研究当代日本文学的佳作。书中在论述“第三新人”流派、“内向的一代”流派、当代女性作家以及中上健次、岛田雅彦等的创作特质时,我们能看到作者所做的详尽的文献综述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阐述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书中有一段关于战后家庭文学的表述:

丸谷才一赞同地说,与日本人“二战”之前的社会生活相比,战前的人们与附近邻居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而[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日本人生活却增加了强烈的隔绝性。其实所谓“团地”小区就是那种“现在性”公寓。秋山骏进而指出,住在公寓中的人自然可以拥有个人的或个性化的生活,但建设这种公寓式居宅的原本期望,却是基于住户间的横向联系。意在培育出西欧式的市民社会连带意识。然而二十年过去之后却恰恰相反,大家生活的雷同使人们对邻家的生活失去了兴趣。

秋山骏承认“市民”意识与现代个人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他再度强调“团地”是十分有趣的一种场合。现实中的居住房间比过去少，出现了两人、三人一家的“核家庭”（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于是以往家庭的种种关联都被切断，呈现出一种孤独性的生活状态。……秋山骏赞同丸谷才一的解释。同时强调说，“团地”的真正形成是在1960年前后。此时的东京已成为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所谓“核家族”现象相应地日益明显，家族问题也引起世人的关注。那么此时的“家”意味着家族，还是家庭？秋山骏认为在以前的日本文学中，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那么如今的现象，是对前述的家庭的反抗么？此时，同样涉及现代的“自我”问题，如今的“家”主要表明了某种夫妇关系，因而此期小说中的描写内容也主要变成了夫妇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在之前志贺直哉的小说中，有关家庭的主要表现的是父子关系。十分有趣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后来也出现了十分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倒是时时涉及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只是不同于战前那种儿子与父亲的纠葛，而是女儿与母亲间出现的问题。^①（“核家庭”在本书非引用文字中一般以“核心家庭”表述——编者注。）

在研究、分析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内向的一代”流派方面，翁家慧（2010）撰写的《通向现实之路 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专著，是研究文学流派中难得的样板。书中的许多观点都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如在论及“内向的一代”创作的家庭小说的特点时，作者指出：

（本书）以家庭小说为例，比较近代私小说和“内向的一代”的作品之间的不同，并由此发现“内向的一代”的作品已经不再像近代私小说作品那样以父子矛盾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有的作家把父权的消失和新的父子关系作为小说创作的主题。而且，“内向的一代”的很多作品都将重点放在了夫妻关系上。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夫妻既不是血亲的亲情关系，也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恋人关系，而是建立在婚姻制度之上的契约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婚姻被解释为两个自由人自愿签署的契约，与此同时，个人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显现出来，即个人存在的绝对孤独。可以说，“内向的一代”率先以小说的形式预示了现代核心家庭的潜在危机，同时，还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在自由与存在的重负

^① 魏大海. 日本当代文学考察[M].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54-55.

之间的矛盾。^①

李征(2012)在《都市空间的叙事形态——日本近代小说文体研究》一书中就论及了日本战后“第三新人”流派笔下的家庭小说(第四章)以及村上春树、岛田雅彦等(第五章)。虽然作者是从文体上进行分析,但最终还是阐述了作家的特点和小说的主题思想。如在分析小岛信夫的《拥抱家庭》时,书中这样写道:

此后小岛信夫又写了《岛》《拥抱家庭》等作品。后者是他中期的代表作,为他奠定了在战后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描写人到中年的大学教师三轮俊介,尽管对自己的家庭怀有责任感,却不知怎样才能管理好这个家。

家庭的解体是日本战后一大社会现象。三轮俊介既是这一结果的体验者,又是作俑者。他是外国文学翻译家,曾经到海外进修一年。归国后经常有人拉他去座谈会或讲演会,针对主妇听众发表一些诸如“关于外国家庭生活”的演说,而他自己也写有《主妇之道》之类的文章。在旁人看来,他家的确可以称得上现代开放的典型。因为外人经常能够看到美国兵在他家自由出入。当他问妻子与美国兵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时,妻子回答说:“这事你该学会忍耐,冷静点,就像看一幕喜剧一样。对外国文学你比我懂。”说得他哑口无言。他所问的正是那种使他频频陷入难堪境地的现状,因而内心不愿接受。妻死子去,家庭也随之解体。儿子良医出走,无疑象征着新一代为寻找新的“关系”的建立,从空洞化、徒有其表的家庭的脱出。评论家江藤淳在《成熟与丧失》中,对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的性格做了极富象征意味的分析:“他既非‘母’又非‘父’,虽有‘家’却又无治家方策。”认为这个主人公形象是日本社会父权丧失时代的表征。^②

——南京大学叶琳(2013)主编的《现当代日本文学女性作家研究》一书论及的女性作家达15位,诸如大庭美奈子、河野多惠子、中泽慧、林真理子、山田咏美、小川洋子、青山七惠、津岛佑子等,应是当前我国学者研究现当代日本女性文学最齐全的著作。由于该书论述的大多是某位作家或某一篇文章,因此将在后面论

^① 翁家慧. 通向现实之路 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20-221.

^② 李征. 都市空间的叙事形态——日本近代小说的文体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77.